

张 滢 ● 著

功能语言学视角下的 跨体裁劝说研究

Persuasion across Genres:
A Functional Linguistic Approach

上海大学出版社

H0
231

138486

张 滢 ● 著

功能语言学视角下的 跨体裁劝说研究

Persuasion across Genres:
A Functional Linguistic Approach



贵阳学院图书馆



GYXY138486

上海大学出版社

08283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功能语言学视角下的跨体裁劝说研究:英文/张滢著.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5

ISBN 978-7-81118-160-9

I. 功… II. 张… III. 功能(语言学)-研究-英文
IV. 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0760 号

责任编辑 张芝佳

封面设计 柯国富

技术编辑 金鑫

功能语言学视角下的跨体裁劝说研究

张滢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

(<http://www.shangdapress.com> 发行热线 66135110)

出版人:姚铁军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5 字数 499 000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 100

ISBN 978-7-81118-160-9/H·166 定价:30.00 元

西方修辞学：传承与发展

——体裁与劝说研究新论

(代序)

胡曙中

之所以用“代序”，因为想有个题目，有了题目再加上副标题，就可以对张滢博士的研究成果介绍得清楚些，当然也使本人的评介被读者看得明白些。

西方修辞学成了当今许多语言学科的基础，这一点几乎已成共识。它对语言的使用所产生的长达数个世纪的影响尤其重大，现在研究句子层面以上语言学的进路，其理论灵感盖源于西方修辞学。

20 世纪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取向，又极大地丰富了西方修辞学的理论宝库，使这一传统中的体裁分析和修辞分析发展为今天的语体学和语篇语言学的重要研究内容。

西方修辞学之所以能成为当今许多语言学科之基础，不仅是因为这一古老学科是西方文化和教育最主要的基石之一，更重要的是因为由这一学科所形成的传统具有无比的生命力。这一传统在古典时期所规定的许多研究内容，至今仍是西方许多学术研究领域的热点，尽管在历史的进程中受到过挑战，甚至被否定，但更多的是承袭与补充，尤其是在话语和知识、交际和效果、语言 and 经历等几组关系方面，这一传统所表现出来的因袭和发展，更说明了这一门学科是当今许多学科，尤其是语言研究学科的基础。

根据 Donald C. Bryant 的研究，西方修辞学首先而且主要是关于信息性和劝说性话语的学说，其他关于修辞学的定义其实都是这一定义的衍生。这一定义至少源于亚里斯多德，而且至少从亚里斯多德开始就对修辞学的原则有一整套的规范。像他的诗学理论一样，亚里斯

多德的修辞学理论在这一学科领域中所具有的学科地位确实是无与伦比的,虽然他的理论在历史的进程中受到过许多的补充和修正。但是,他理论的局限性是历史性的,而不是哲学性的,就像他的诗学理论一样,他的修辞学理论的局限性,主要是没有对还没有出现的现象,或没有产生的学问进行过思考或借鉴(“Rhetoric: Its Functions and Its Scope”,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39, 1953)。

从亚里斯多德开始,西方修辞学就将自己的研究范围定位于所有话语和使用符号的交流形式,其目标是从大量的人类话语中选出那些被认为具有劝说作用的成分,对这些成分进行分门别类的归纳,根据结构和目的对每一种类的成分进行分析,并识别构成每一种类的方法。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西方修辞学既对语言使用的正误性原则表示认同,也对有效地使用语言的方法进行分类。它不仅对如何提出证据和论辩的方法进行说明,还为准确推理过程的原则做出规定。

对话语过程探索之兴趣一直在西方修辞学家的研究视野之中。西方古典修辞学对话语过程的探索,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是当今话语分析或语篇分析的雏形研究。根据 G. Kennedy 和 G. C. John 的研究,古典修辞学家昆提利安就开始根据交流行为中的主体和参与者这两方面的因素,把话语的生成过程分成构思、组织、转化和传送(*Quintilian*,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Inc, 1968; “Towards a Linguistic Typology of Prose and Poetic Texts”, Unpublished MA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Exeter, 1978)。昆提利安也对话语的成品进行过研究,他以三种不同的演讲为例,确定适合每一种演讲的外部因素。他发现政治家的议政演讲话语适合劝说性的场合,法官的法律演讲话语适合辩护性的场合,布道者的宣德演讲话语适合礼仪性的场合。根据 R. R. K. Hartman 的研究,这种话语“听众诉求”的假设是话语分类的理论框架,这一假设在今天对话语进行分类时仍然还有很大影响(*Contrastive Textology*, Heidelberg: Julius Groos Verlag, 1980)。

从亚里斯多德那时开始,就提出了话语形式与社会情景有关的思想,并把修辞演讲语篇与特定的社会情景联系起来。西方修辞学已经为话语的分类、适合的情景、话语的作用等进行了探索和规定。之后的修辞学家们又拓宽了修辞话语的分类形式,把布道词、书信、所有的语篇形式,甚至交谈,只要有明显的劝说目的,都归入修辞话语之列。

如今,就像过去一样,亚里斯多德关于演讲的性质及其原则的论说,关于在某一特定场合下寻找所有劝说手段的论说,一定是任何成熟修辞学体系构建的理论背景。从这一学问刚一问世起,西方修辞学就不仅产生了研究语言实践的一套体系,而且还提出了涉及语言与知识之间联系的许多具有深远意义的理论问题。西方修辞学的作用和影响之大,不可能只被局限于对演讲的几种形式的研究,它提出了关于语言与知识的问题,只是在当时没有解决。古典时期之后,修辞学的范围被扩大了,乃至今天,事实上所有的话语和使用符号的交流形式都能够被归入其研究范畴。

西方修辞学这些早期的研究兴趣和内容,后来就成为当今许多学科的基础,尤其是语体学和语篇语言学。

根据 J. Grimes 的研究,在西方修辞学中有一种基本的假设:话语可以用一种“正确的”,因而是有效的方式进行传递,或者可以用一种“错误的”,因而是无效的方式进行传递,但是正确的传递方式是能够被传授的(*The Thread of Discourse*, The Hague: Mouton, 1975: 12)。这一基本的假设迄今仍还被认为成立的,也正是这一基本的假设,使这一古老的传统不仅能够得到承袭,而且还外延茂盛。

西方修辞学在对话语传递的方向上是偏向于“演讲者(即传送者)”,尽管如此,这一基本的假设还是证明了西方修辞学对作为真实话语的语言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真正的兴趣。虽然西方修辞学从未明说,但其目的是要对有效交流的范畴和标准进行分类和加工。这一研究包括了交流过程中的“演讲者(即传送者)”、“听者(受众)”和“信息”等方面,因此西方修辞学无疑率先对现今许多交流模式的基本组成部分做了开拓性的研究和描述。

综上所述,可以说西方修辞学从理论源的角度,为当今语体学和语篇语言学中许多重要的研究内容进行了非常有价值的规定和探索。

与当今语言研究和外语教学有着密切关系的几个基本研究内容,比如“话语形式和分析”,“交流目的、对象和情景”,“体裁”,“话语的作用”,“信息”等,都源于西方修辞学传统。这些基本内容的内涵经过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开发和提升,至今仍还是“文体学”、“语体学”、“话语分析”、“语篇语言学”等学科的主要研究内容。

已有研究表明,西方的“体裁”理论正在对我国英语教学,尤其是写

作、阅读和翻译教学产生着不可估量的影响。现在语言研究领域中的“体裁”理论,其实也是与西方修辞学传统中关于“体裁”的思想有关,这一思想或许始于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他们认为语言的形式是有机的,并强调分类的形式特征。他们对论辩、诗歌和戏剧等文学体裁分类的兴趣,便是这种思想的佐证。在《诗学》中,亚里斯多德把诗分为不同的种类,比如史诗、悲剧、喜剧等。他对文学体裁的这种分类,就是后来发展成文学“文体学”的研究内容。

源于西方修辞学传统的“体裁”分析,先发展出文学“文体学”。按文体分析的传统做法,是把有关文学的内容与作品的传记、社会和心理等方面联系起来分析。后来文学文体学又流行起另一种做法,就是通过仔细阅读,把历史与语言的信息互相联系起来,并寻找文本中具体刺激与美学反应之间的关联,并以此来解释文本中文体这一难以分辨的现象。这一做法对承袭已久的传统进行了质疑,于是,“文学”文体学者之间在对文体的界定上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看法,一些学者把文学内容和文本细节作为文体分析的基础,而另一些学者认为文学内容之外的因素与文体有关。

直到俄罗斯形式主义和文学结构主义出现后,才逐渐产生对文体的分析要把整个文本加以考虑的做法。因此,文体和情景之间的联系,文体作为常规的偏移——这些就成了文体分析的显著特征。这些做法所产生的影响长达几十年,有一些文体研究学派还继承了这些特征。

随着语言学的转向,出现了要从文本中研究文体的学术研究倾向,因此“文学”文体学就拓展了自己的研究范围,把整个文本都包括了进来,这种从情景之中研究文本的新观点就使得文体学有了新的内涵。这种对文体所持的新看法就产生了对语言变异现象的处理方法,它就是对句子层面以上的关系进行变异与常规之比较。这种分析方法强调典型的文本材料,强调这些典型的文本材料与主宰文体选择的情景范畴之间的关联,因此就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分析框架。正是在这个分析框架中,对文体的认识逐渐发生了转变,文体因此具有了语篇类型所具有的不确定性的性质,这种认识上的变化为对体裁做进一步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从亚里斯多德开始,修辞研究和修辞批评就对话语的分类发生了兴趣。使用从普遍到特殊研究法的修辞学家们,往往用演绎推理的方

法建构一种关于范畴的封闭式的体系,这种研究方法以 J. Kinneavy 为其代表。他把话语分成四种类型:表达、劝说、文字、指代,他分类的依据是按照在交流过程中哪个组成部分是中心。比如,如果侧重点是在传送者,那么话语的类型就是表达型;如果在接收者,就是劝说型;如果在语言形式或符号,就是文字型;如果想体现世界的现实性,那就是指代型(*A Theory of Discourse*, Ea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71)。虽然这种分类的方法有令人赞叹的理论依据和一定的分类作用,但是一开始就对话语类型定性的这种做法,往往会无法对某一具体的话语做出恰当的分类。

而倾向于使用归纳性研究方法的修辞学家们,往往会较多地把语境的因素考虑进去,他们在对话语进行分类时主要考虑体裁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尤其是那些研究话语发展史的修辞学家们,他们强调在体裁创造中同样形式的反复出现,以上这种观点其实更多地是在阐释体裁理论,而不是对体裁进行分类。他们提出了可以用修辞比较来建立一种对某一具体语篇的体裁认定法。“体裁是一组行为,它们被一组形式统一了起来,这组形式反复出现在这一组的每一个行为之中。如果孤立起来,这些形式会出现在其他的话语之中。体裁中行为的特殊的地方就是:形式以一组的方式反复地出现。”(Karlyn Kohrs Campbell and Kathleen Hall Jamieson, “Form and Genre in Rhetorical Criticism: an Introduction”, *Form and Genre: Shaping Rhetorical Action*, Ed. Campbell and Jameson, Falls Church, Va: The 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1978: 20)体裁是不稳定的独立存在物,“任何社会中体裁的数目是不确定的,它取决于社会的复杂性和差异性的程度”(Carolyn R. Miller, “Genre as Social Ac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1984, 70: 151 - 67)。Miller 还提出要把体裁分析的范围拓宽到对话语的类型分类(155),这一观点明显具有令人瞩目的创见成分。

由上可见,修辞体裁学家们对体裁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他们为体裁发展提出了颇有价值的历史语境理论,并推翻了体裁分析必定与体裁分类有关的传统观念。

由于语言学转向,“体裁”现在越来越成为语言研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概念。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对学术性英语写作的研究范围

不断拓宽,体裁分析原先只研究学术论文体裁,现在发展到把学术和专业语境下的其他体裁也包括了进来,因此为话语分析或语篇语言学提供了新的理论和进路。

当今,西方也许是 J. M. Swales 的体裁分析理论影响较大,他的分析是基于对书面学术写作中的组成部分或步骤的研究,尤其是对科研论文内容结构的研究。西方另一种有影响的体裁分析理论是由 Carol Berkenkotter、Thomas N. Huckin 和 John Ackerman 提出,他们强调影响写作的社会和交际方面的因素(“Conventions, Conversations and the Writer: Case Study of a Student in a Rhetoric Ph.D. Program”, *Research in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22, 1988: 9-44)。

Swales 对体裁的观点侧重于话语的交际目的,他认为在体裁的定义中占有中心位置的是话语社团,这个社团就特定体裁所具有的可接受的特征达成共识。在 Swales 看来,科研论文、申请资助提案和书籍等都代表了不同的体裁,它们的交际目的不同,因而它们的图式结构不同。Swales 认为,体裁不同于语域,因为体裁为一个文本中的不同部分规定了结构条件,比如开头、正文和结尾,而语域从整体上规定了语言及其相适应的语境、情景之间特征的关联性,这一特征的关联性通常是用一个文体的正式程度—非正式程度的连续体来表示。因此,科技报告的语域,往往(虽然不总是)不同于报纸专栏的语域,但是这两种体裁可以使用由这两种体裁的社团成员所规定的不同的图式结构(*Genre Analysis English in Academic and Research Setting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还有学者在研究体裁时提出,体裁之中还有次体裁,次体裁之间也有不同,这是因为不同的交际目的和所使用的不同的策略(V. K. Bhatia, *Analyzing Genre: Language Use in Professional Settings*, New York: Longman, 1993)。因此,在研究论文的体裁之中,还有几种次体裁,比如综述论文,评论文章等。同样,申请信和销售信是两种次体裁,它们都属于同一种体裁,都是具有促销性的文字,但两种次体裁的交际目的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劝说雇主或顾客相信申请或销售的价值。

Swales 和 Bhatia 的体裁研究法,都有助于对话语形式的不同范畴进行区分。C. L. Briggs 和 R. Bauman 的研究指出,以上对体裁的定义是受到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对体裁范畴的规定。亚里斯多德认

为,“史诗”和“悲剧”之间的区别是基于它们不同的结构、传送和接收的方式,因此他提出,要对这些体裁的结构和以内容为基础的规约做出规定(“Genre, Intertextuality, and Social Power”, *Journal of Linguistic Anthology* 2, no. 2, 1992:131-172)。

当今关于“体裁”的界定,在很多语言学家眼里,是和语篇类型没有严格区别的,经常可以互换使用,但有些语言学家对这两个概念有严格的区分。现在一般认为,体裁是以外部和非语言因素为标准对语篇的分类,而语篇类型相反,是以内部和语言因素为标准的分类,所以,体裁一般是以传统的文化因素为基础,如听众/读者、活动目的和类型,而语篇类型则以语言特征为分类基础,如词汇和句法特征。比如 D. Biber (1988:170)就认为,体裁是以外部因素为标准划分的范畴,这些标准跟讲话人的目的和话题有关。体裁划分的出发点是用途而不是形式(*Variations Across Speech and Writing*,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170)。Bhatia(1993)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体裁的性质可以通过外部的标准加以具体化。在他看来,外部因素通常应该包括讲话人/作者和听话人/读者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Analyzing Genre: Language Use in Professional Settings*, New York: Longman, 1993)。但按 EAGLES (Expert Advisory Group on Language Engineering Standards)1966 年的标准,话题不属于“外部因素”,而应视为“内部因素”,“话题是语篇内部分析的词汇层面”。正因为如此,David Lee 认为在界定体裁时最好避开话题这一有争议的概念,而把体裁的界定标准限制在那些容易确定的外部参数上(“Genre, Register, Text Type, Domains, and Styles: Clarifying the Concepts and Navigating a Path through BNC Jungle”, *Language Learning & Technology*, 5, 2001:38)。这样的话,来自不同体裁的两个语篇就很有可能属于同一个语篇类型,它们在语法形式上存在共享的特征,比如自传和小说有可能都具有[+过去]和[第三人称叙事角度]的特点。B. Patridge 在一篇名为“体裁、语篇类型和语言课堂教学”的文章中的结论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体裁可以共一个类,比如广告和警察的报告有可能是描写语篇;同样,同一个体裁的语篇,如正式信函,则有可能同时跟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篇类型有关,如说明语篇和问题—解决语篇(“Genre, Text Type, and the Language Learning Classroom”, *ELT*

Journal, 50 (3), 1996: 237 - 43)。

体裁或语篇类型的研究由于旨在对体裁或语篇进行更加合理、更加科学的分类,其成果不仅是理论上的,而且对语言教学、翻译和语料库建设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其实,西方有关体裁或语篇类型的理论,在我国英语教学中的研究与应用并不是多么新鲜的话题,但过去的研究主要局限在文体和功能方面,这样的研究自然有其价值,特别是在写作领域。但是,这样的研究大多数不能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最多不过是对现有理论的应用,而且效果不一定很显著,并且不可能持续多久,这主要是因为西方关于体裁的理论,以我的看法,主要解决的是与体裁有关的哲学的问题,我比较倾向于有些学者的观点,它是说明了影响“语篇”之所以成其为“语篇”的外部的、非语言的各种关系,而要了解和分析“语篇”内部的语言问题,单单依靠体裁理论恐怕是不行的。对我国英语教学来说,体裁理论不能真正有助于我国的英语教学,因为它无法有效地帮助我们的英语教师和学生了解体裁内部的语言结构和规律。再说,西方体裁理论起源于西方,比较适应于母语或二语教学,似乎不能全盘照搬到我国英语教学的实际之中。

而呈现在大家面前的张滢博士的研究成果,却使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了国内学者在体裁研究方面迈出的的一大步。

作为这个研究成果的第一位读者和评论者,我以为,张滢博士的研究对这一源于西方修辞学传统,并在当今语言研究领域中已经成型的体裁理论有了突破性的成果。她解决了如何进一步丰富关于体裁及其劝说作用的理论的问题,具体地说,她把对体裁理论的研究与当今语言显学的有关理论整合并交融了起来,构建了一个语篇分析的交叉性的理论平台,既提供了理论视角,又提供了进路。

这一研究之所以成功,就在于找准了现在我国外语教学和研究领域中体裁理论所没有能够真正解决的语言使用问题,这一研究所提出的认识和使用语言的理论和方法,肯定会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

Acknowledgements ■■■■

When this experiential, psychological and intellectual odyssey comes to its finishing touch, the time is ripe to extend my heartfelt and long – lasting gratitude to so many people for their kindness, guidance, help and support.

First, I express my sincere gratitude to my supervisor, Professor Hu Shuzhong, for his unfailing encouragement, careful reading, informed suggestions and consistent help. His integrity and penetrating insights have impressed and enlightened me so much. Throughout my years in SISU, he has proven to be the epitome of professionalism and scholarly life, and I value the knowledge and opportunities his teaching has provided.

Several schola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corresponded with me about my ideas and research, and I thank them all, including Professor Susan Hunston of Birmingham University for input on the impetus and importance of her researches on evaluation, Dr. Peter R. R. White of Adelaide University in South Australia for the helpful exchanges on the research on solidarity and for his generous offer

to send me his new book co-authored with Professor J. R. Martin *The Language of Evaluation: Appraisal in English*, Dr. Almut J. Koester of Birmingham University for her kind care and encouragement.

My heartfelt gratitude goes to the leading group and my colleagues at Foreign Languages College, Shanghai Maritime University, and those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for their favors and encouragements.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love and deepest gratitude and appreciation for my husband and parents, whose faith in my abilities sustained me through difficult times.

Last, but not the least, personal thanks are due to the editor, Zhang Zhijia, from Shanghai University Press, for her generous help in producing this result.

Abstract

The objective of classical rhetoric lies in the demarcation, categorization and analysis of persuasive elements from the multitude of human discourses; among the amalgam of many perspectives in New Rhetoric, in spite of the spread of rhetoric from its original habitat in the world of direct vocal exchange into newly created areas of discourses, the common focus is still on persuasion. However, in the postmodernism context, "persuasion" has become the rhetoric on the stratum of discourse across genres.

Moreover, a comprehensive, explorative and practical discourse research paradigm makes a prerequisite the interface between functional text linguistics, genre analysis and rhetoric.

In real communication acts, in concrete generic practices, how is "persuasion" defin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language as socio-cognitive, as generic action, and as functional discourse semantic, how is "persuasion" realized, on the discourse level, as lexico-grammar, semantics, structure and informational web? Is it possible for an inter-disciplinary and feasible rationale to, theoretically, tackle the issue of the

above mentioned disciplinary interface, and practically, based on the exploration of corpus, apply to real communications, genre pedagogy and research?

In the above contexts, this dissertation assimilates, investigates and develops Burkology in New Rhetoric, the genre-based view of discourse analysis, and the newly founded Appraisal theory in Systemic Functional Grammar, to firstly, construct a multidisciplinary philosophical model of persuasion, then, theoretically and experimentally, to explore the functional grammatical patterns and modes of that model in the members of the Promotional Genre Colony.

Theoretically, through constructing a text analysis framework of the interdisciplinary interface nature and then probing into the practices of authentic text data across different domains, this dissertation attempts to find the systemic, functional and socio-cognitive rationale and paradigms of persuasion in the English Promotional Genre Colony; and pedagogically, this dissertation is supposed to provide insights and resources for ESP and EAP teaching and research.

As an overall framing of this study, a very general explanation of the origins and objectives, terminologies, data rationales, theoretical sources and methodology of this study, is provided in Chapter 1, Part One.

Chapters 2 as the literature review, positions this study of persuasion in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interdisciplinary landscapes. Besides relating this present study to other works in rhetoric, genre theory and functionalism theory of evaluation, this chapter makes a critical survey of those related studies, pointing out the gaps in which this dissertation is promised to fill.

Part Two provides the theoretical rationale construction. The interdisciplinary rationale construction means that it is addressed progressively through a number of chapters in this dissertation. In

Chapter 3, Burkology in New Rhetoric is investigated and applied to define and explicate persuasion as the rhetorical discourse semantic construction of socio-semiotic identification and consubstantiation. Since persuasion as a rhetorical attempt must operate in generic units, and genre is the mechanics through which we do rhetorical persuasion, Chapter 4 defines and demarcates, firstly, genre as the site of centrifugal and centripetal forces at work in the rhetorical community, secondly, the Promotional Genre Colony as a genre group integrating assimilation and colonization. Moreover, Chapter 4 explicates the agnation of the Promotional Genre Colony through applying topology as the interdiscursivity rationale. Evaluation, as the linguistic discourse semantic resources for the expression of the addressor's socio-cognitive elements of attitude, stance, viewpoint or feelings, for his projection of ex-textual world, and for his negotiation and interaction with his audience, represents itself as the key dimension in our pursuit of the linguistic realization of the rhetorical and generic persuasion. Chapter 5 briefly explores the evaluativ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which is mainly informed by the Appraisal theory, the recent development of evaluation research in SFL tradition.

Chapter 6 synoptically depicts a three-dimensional discourse semantic construction of persuasion: on the rhetorical discourse semantic level, persuasion is identified as a discourse act; on the generic discourse semantic level, persuasion is instantiated as the generic organization and on the linguistic discourse semantic level, persuasion is interpersonally instantiated as the functional phenomenon—evaluation.

The three-dimensional model of persuasion provides a compass to locate the detailed and kaleidoscopic operational grammars in the members of the Promotional Genre Colony in Part Three. Corpora of the fundraising letters and the RA introductions are set up by the author of this dissertation as the resources for data analysis. The

aims of data analysis are not only to find the general applicability of the three-dimensional model of persuasion in different generic actions but also to locate the detailed instantiation modes and patterns in specific generic actions.

Chapter 7 probes into the three-dimensional persuasive paradigm in the fundraising letters as Macro-proposals. The Attitude resources as the sub-system choices of Appraisal are found to instantiate and scaffold the three-dimensional persuasion. Chapter 8 probes into the three-dimensional persuasive paradigm in the fundraising letters with Macro-propositions embedded in Macro-proposals. The Attitude resources are found to instantiate and scaffold meta-relations of rhetorical identification and to act as growth-points of the interactive generic pattern and matrix. Chapter 9 and Chapter 10 respectively probe into the three-dimensional persuasive paradigms in the RA introductions as Macro-propositions. The Graduation resources as the sub-system choices of Appraisal are found to instantiate and scaffold the three-dimensional persuasion. And when persuasion in the RA introductions is treated as the negotiation of identification in the disciplinary rhetorical community, the Engagement resources as the sub-system choices of Appraisal are found to process in the text with the continual shifting between opening up and closing down dialogic spaces, with the purpose of negotiating identification.

Lastly, Part Four, Chapter 11, concludes by summarizing the major findings of the research and by discussing the theoretical and pedagogic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research. A final section considers a number of ways in which this research can go further in the future.

On one hand, through constructing the interface between rhetoric, genre analysis and SFL, this dissertation contributes to reaching a unified and in-depth investigation of the rhetoric of persuasion as a functional discourse act, which accommodates both the abstract demarcating and defining of the concept, system and